

China Cream of Culture & History 2008

向继东 编选

2008

中国文史精华年选
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韩福东 张颖 陈刚 雷敏 ◇

胡福明：写文章时已准备坐牢

鲁利玲 ◇ 我亲历的“四五”运动

陶恒生口述 李菁整理 ◇

我的父亲陶希圣与“高陶事件”始末

韩子华口述 关昕整理 ◇

韩复榘的功与过

林雪 ◇ 1949年后的“双枪老太婆”

吴学昭 ◇ 听杨绛谈往事

资中筠 ◇ 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

李南央 ◇ 好一个“小兵”金敬迈

雷音 ◇ 向达与翦伯赞

晓风 ◇ “小”人物·大尊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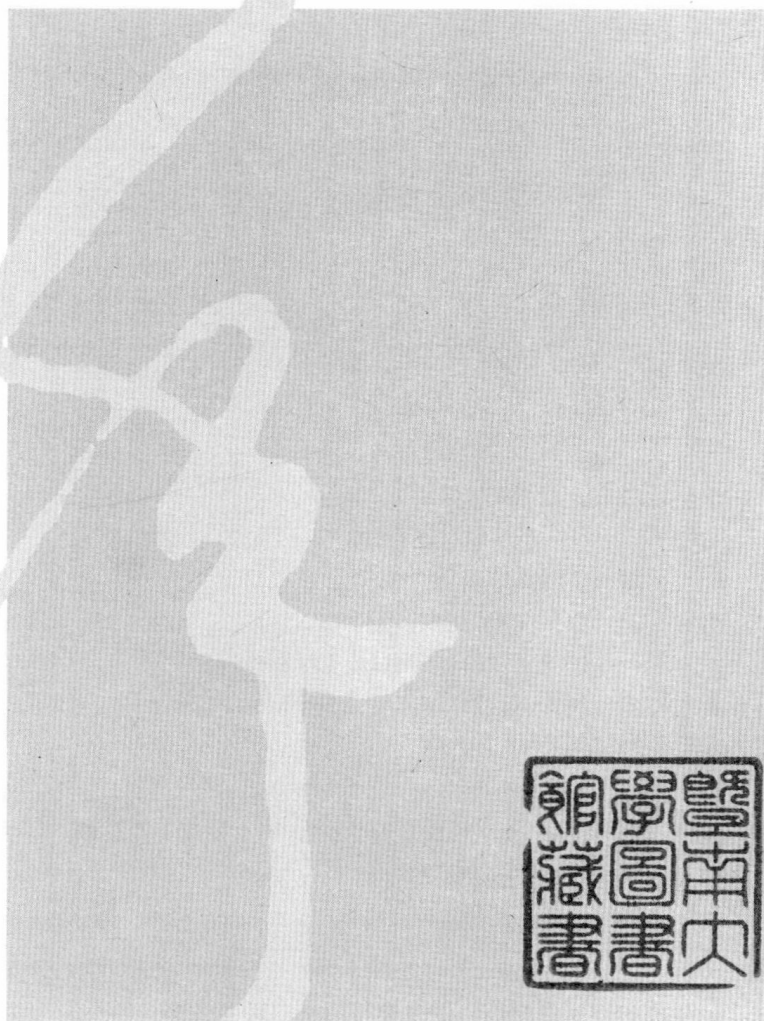
C52
200620
2008

China Cream of Culture & History 2008

向继东 编选

2008

中国文史精华年选


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8 中国文史精华年选 / 向继东编选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09. 1

(花城年选系列)

ISBN 978-7-5360-5558-2

I. 2… II. 向… III. 文史资料—中国—2008—汇编
IV. K250. 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8151 号

责任编辑: 海 帆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)

开 本 787×1092 (毫米) 16 开

印 张 19.25 1 插页

字 数 400,000 字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7,000 册

定 价 4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中国

100

余姚 姚 2000 年 12 月 1 日

1992

续表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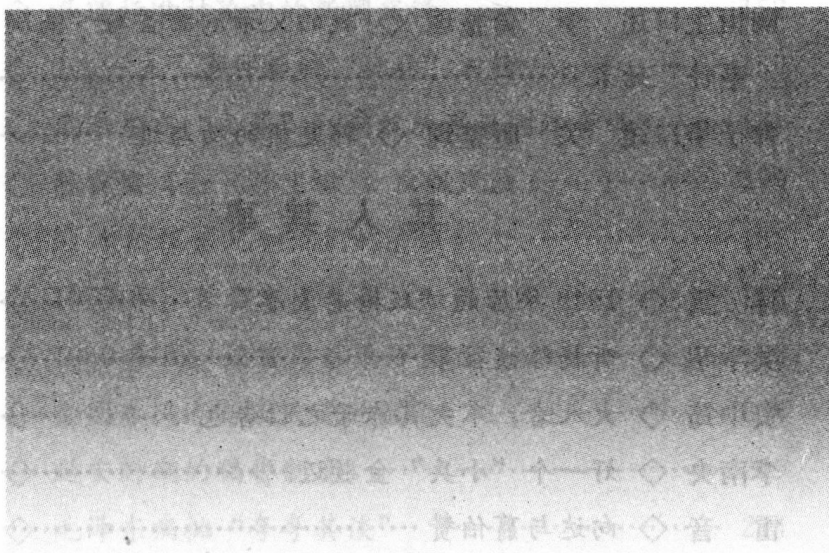
潘後民

张惠言

1997

2008

中国文史精华年选



前言

向继东

去年的“文史精华年选”编了篇《“草原英雄小姐妹”背后的故事》，书出版后，有不少朋友打来电话或是发来邮件说：“这故事骗了我们几十年，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啊！”说过之后，不胜感叹。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，真正救了“小姐妹”的人因为是“右派分子”而换成了别人；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媒体在大肆塑造“救人英雄”的同时，却要另一个真正的“救人者”承受人生的磨难。是媒体人的错吗？确实也一言难尽。

有人说过，今天的新闻，就是明天的历史。自己作为传统媒介从业者，却没能躬身践行。现在有一种很强势的观点：说当下媒体的竞争就是观点的竞争。其实这说绝对了，“事实为王”恐怕是永远不能变的，记下了事实，就记下了历史，因为任何观点都是可能被颠覆的，这一点媒体人切不可忘记。再者，如果基本的事实也没弄清楚，就说三道四，无异于瞎子摸象，难免瞎说。更有人直截了当地说，新闻之所以不能成为历史，就因为我们过于强调它的“宣传功用”、过于强调“角度”了。这是有道理的。1958年“亩产过万斤”不是各大报竞相报道的头版头条吗？——因为要“宣传大跃进”的成就。1960年2月发生在山西平陆县的61人中毒案，人们是通过报道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》最先知道的——这就是所谓的有“角度”的经典报道，赞扬这是“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”，是谱写了“又一曲共产主义的凯歌”！明明是有人投毒，但该报道只字不提，把坏事变成好事，最后演绎成了党和政府对61位阶级弟兄的大救援——一箱来自北京特药商店的二巯基丙醇，被及时空投到山西平陆，使61个中毒民工因此脱险；而中毒事件的内幕以及是谁投毒，事后才慢慢知晓。也许，本书中的《61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》是人们首次看到的完整披露这一事件内幕的文章。

由此我想，新闻讲角度是必要的，但讲角度不能掩盖事实真相，不能欺骗人们，而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新闻场景本身。我在业界混了近二十年，耳闻目睹多多，如何把新闻写成历史确实绝非新闻记者本身的事。我们要角度，首先要

想到新闻基本事实的真实，否则几十年后的人们，也会像今天的我们笑话当年的“亩产过万斤”一样。至于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》还被当作新闻经典教材，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在某些方面进步太小了。

我们曾经历过“千条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”的年代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有不少人曾因说错了一句话，写错了一个字，或杀头，或坐牢。原因在哪里？就在于一切日常生活都被“极端政治化”了。“极端政治化”掩盖下的历史，是没有真相可言的。根据需要，什么都可以编造出来。

如今大凡三四十岁以上的人，应该都还记得小学课文《半夜鸡叫》吧。《半夜鸡叫》中的地主周扒皮，每天半夜里起来学鸡叫，把刚刚入睡的长工们叫起来下地干活。可日子一长，被长工们发现了秘密，周扒皮反被长工们当小偷在鸡窝边一顿臭打。此文选自自传体小说《高玉宝》，作者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“文盲作家”高玉宝。几十年后，记者采访高玉宝：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？如果真有其人，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？他回答说：《高玉宝》出版时，写明了是小说，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。但在那个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，人们硬是把“周扒皮”的形象坐实在一个叫周春富的东北农民身上。其实这个周春富，是个腰间常年“捆着破布条”（因为节俭）、“从不闲着”的农民。他一辈子就是勤俭，再勤俭，然后买地。1947年，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，他家被划为“地主”，并在开斗争会时被活活打死了。周春富死了，其后代在“阶级斗争、一抓就灵”的时代，境遇凄惨，可想而知。收入本书的《“周扒皮”的1947》就澄清了这个事实，人们在感慨唏嘘的同时，还看到了历史深处的暗角。

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，由于《高玉宝》、“收租院”等宣传品的巨大影响，以周春富为原型的“周扒皮”，还有川中大地主“刘文彩”等，都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“地主”代表。他们的“罪恶”被写进书里，绘成连环画，拍成电影，成为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经典教具。本来地主们的财产早就被剥夺干净了，沦入社会最底层，可仍被隔三差五地拉出来批斗。而且他们的原罪还要祸及子孙，除非子孙与父辈们彻底斩断伦理关系，加入到揭批父辈原罪的革命大军中来；否则，这些曾经的地主子孙就要继承父辈们的原罪，不仅成为被革命、被专政、被改造、被批斗的对象，甚至男婚女嫁都成了巨大的问题……

历史终于翻过这沉重的一页，但要清理这段历史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我也知道，有些尚需时间沉淀，不便贸然言说，然而决不可放弃。我们要抱定一颗平常心，一点一点地耐心去做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每年很有一些好文章，但由于讲述方式的原因，有深刻性，少可读性，只能忍痛割舍了。有朋友问我：这书到底选什么样的文章？“要么有新材料、要么有新见识”是编者一以贯之的追求；不抄书、不戏说、不猎奇、不虚饰是编者的选稿原则。有许多朋友始终热情支持这本年选，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其文章迄今未能入选，在此深表歉意，并愿以后能弥补这个遗憾。

2008年11月6日于长沙

目录

向继东 ◇ 前 言	1
-----------------	---

口 述 实 录

韩福东 张 颖 陈 刚 雷 敏 ◇ 胡福明：写文章时已 准备坐牢	2
鲁利玲 ◇ 我亲历的“四五”运动	10
陶恒生口述 李 菁整理 ◇ 我的父亲陶希圣与“高陶 事件”始末	16
韩子华口述 关 昕整理 ◇ 韩复榘的功与过	28

其 人 其 事

林 雪 ◇ 1949 年后的“双枪老太婆”	38
吴学昭 ◇ 听杨绛谈往事	45
资中筠 ◇ 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	54
李南央 ◇ 好一个“小兵”金敬迈	60
雷 音 ◇ 向达与翦伯赞	66
晓 风 ◇ “小”人物·大尊严	72
朱 正 ◇ 《查太莱夫人的情人》和我	81
魏邦良 ◇ “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”	84
利 川 津 津 ◇ 我们连里的七个“反革命”	88
李 蟠 ◇ 一根绳子，两条人命	94
肖复兴 ◇ 老知青蔡立坚生前身后	98
丹 晨 ◇ 洪君彦章舍之政治语境下的非正常生活	102
王国华 ◇ 路翎：作为战士的悲剧	107

中国文史资料

邵燕祥 ◇ 李慎之的“服罪”和“不服罪”	110
何 方 ◇ 悲情革命家孟用潜	115
钦 象 ◇ 象山蒲湾村假墓真相	121
杜 兴 ◇ “周扒皮”的 1947	124
王 伟 ◇ 还你一个真实的白求恩	130
欧阳哲生 ◇ 丁文江的“苏俄经验”	134
蔡登山 ◇ 温雅中有“铁”	140
傅国涌 ◇ 世间已无宋教仁	148

往事沧桑

余焕椿 ◇ 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新闻交锋	152
史义军 ◇ “九一三”事件后的“批林”内情	159
阎长贵 ◇ 毛泽东在“文革”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? ...	171
徐庆全 ◇ 陈寅恪《论〈再生缘〉》出版风波	176
杜 兴 ◇ 61 个阶级弟兄和他们的阶级敌人	185
智效民 ◇ 1955 年：著名文化人收入知多少?	193
李若建 ◇ 1950 年代：谣言席卷千万国人	198
范 泓 ◇ 金圆券风潮与国民党的沉沦	204
孙国林 ◇ 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	209
刘 统 ◇ 毛泽东痛批“夸夸其谈”	214
程巢父 ◇ 抗战胜利后知识分子的舆论幅度	219
宋石男 ◇ 民国四川地震“遗书”	224

文史杂俎

杨天石 ◇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	230
胡文辉 ◇ 史迪威问题与中国现代史的修正（外一题） ...	235
李 杨 ◇ “陶希圣代书《中国之命运》”一说新解	240
陈四益 ◇ 人格的尊严	245

李恩柱 ◇ 孙嘉淦的衰变	248
谢 泳 ◇ 关于《沁园春·雪》的两则史料（外一题） ...	250
雷 颐 ◇ 书与人的命运	253
薛 原 ◇ 萧乾、冯雪峰及其他	256
宋志坚 ◇ 《讨论》、《挑战》及其他	259
汤国基 ◇ 30 多年前的中国地震新闻	262
向继东 ◇ 马歇尔与中国	265
戴 晴 ◇ 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	268
王彬彬 ◇ 汪精卫见溥仪	270
徐宗懋 闻 达 ◇ 万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去台湾始末	272
赵健雄 ◇ 两位初中老师	274

域外瞭望

郑异凡 ◇ 十月的炮声	278
蓝英年 ◇ 一生荣辱话索翁	282
王晓林 ◇ 波尔布特：并不遥远的教训	286
鄢烈山 ◇ 众所不知的废奴英雄：威伯福斯	293
刘兴雨 ◇ 杰弗逊的账单	298

欧桑史文

口述实录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口述实录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（作者：王明贤，口述：王明贤，记录：王明贤）

胡福明：写文章时已准备坐牢

韩福东 张颖 陈刚 雷敏

原刊编者按：1978年5月10日，中央党校内部刊物《理论动态》第60期首先发表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以“特约评论员”署名，公开发表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；当天，新华社转发此文。5月1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同时转载。

2008，是改革开放30周年。这30年，不仅是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的30年，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、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30年。3000年来的每一次改革，从商鞅到王安石，从张居正到康有为，无一不是国家政权的宏大叙事、豪杰枭雄的烙印足痕。唯有这30年的变革，分田按印的农民，摆摊设点的个体户，白手起家的企业主，奋笔疾呼的知识分子，与执政者掌权者一道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。

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奋斗的记忆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凝结的历史。

这里转载访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最初作者胡福明的报道，以还原这场波澜壮阔的洪流中那些真实而鲜活的细节。

30年前，胡福明43岁。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，写下了名篇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，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。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，为否定“两个凡是”、进一步反思“文革”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。

这篇文章改变了胡福明的命运，使他由学界转入政坛；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的走向。彼时，“文革”的创伤尚未痊愈，旧有的思维模式仍强悍地霸占着主流意识形态广场。这是一个需要回归常识的年代，胡福明内心激荡的想法与中央高层的革新力量不谋而合，而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正是国内有识之士在新时期将来未来之际谋划的意识形态“兵变”。“说到底，这篇文章也只不过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，讲了大家想讲的话。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，要出来写文章，要来批判‘两个凡是’，你相信不相信？这是历史的规律。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，而我恰好是写了这个题目，恰好比人家早讲了几句，就起这么个作用。”胡福明对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说。

30年后的今天，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。早上，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。案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《赫鲁晓夫回忆录》。“我原来读过，但是被删了很多，所以这次买了全本。”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。

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“文革”的废墟上启程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。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，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，应该出来说话了。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“四人帮”的大会上，他第一个发言；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“四人帮”的万人大会上，他也是第一个发言。

他还不断在发表文章。1976年，南京大学第四期学报发表了他的《评张春桥的〈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〉》。从1977年开始，胡福明在南大学报上基本上每期发表一篇文章。因为存在争论，他的《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》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才敢发。这时，两报一刊提出了“两个凡是”的论断，胡福明决定向“两个凡是”开火。

批“两个凡是”，心里有点虚

1977年2月7日，两报一刊（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）发表了“二七社论”，提出了“两个凡是”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，我们都坚决维护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，这“两个凡是”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，都要贯彻，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，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，这就不可能了啊，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。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，都要执行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，都要坚持。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，中国人受得了吗？

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，讲教育战线的，我发表意见说，教育质量是下降的，教育领域也很乱，科研也没法搞。当时有些老同志怕我闯祸让我千万别说，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嘛，我从这些现象中觉得拨乱反正降温了。“两个凡是”出来以后，批判“四人帮”更难了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，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，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。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，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，中国向何处去？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，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，观点已经明确了，就是要批判“两个凡是”，但是呢，心里有点虚啊。

我不晓得“两个凡是”是华国锋提的，我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。文化大革命以来，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，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。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，这个罪名可大了。而且“两个凡是”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

想的旗子出现的，那我批判“两个凡是”等于否定毛主席，否定毛泽东思想，这个罪名更大了。反党反社会主义，反毛泽东思想，反毛主席，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。弥天大罪，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，反毛主席不能赦免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由于喊错了口号、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，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。

说领袖也犯错，对凡是派打击最痛

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。越是这个题目，越是不能商量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。一旦事发，肯定牵连。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，第一，我是理论工作者；第二，我是共产党员；第三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

南大校园里私下里都批“文革”，几乎是公开议论，但是没有批“两个凡是”，因为大家没有发现“两个凡是”问题。我发现了“两个凡是”，我只能一个人去搞。

犹豫很久，个把月吧。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，也担心再被整。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，但是怎么搞呢，当然不能说“两个凡是”是错的，写在标题上，公开向“两个凡是”宣战，那是不行的。一个老同志曾根据我的一贯表现警告我说，不要学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许褚，赤膊上阵，要能够保护自己，自己要站住了，才能够打仗。我懂了，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“两个凡是”，我给“两个凡是”另外找了个靶子，叫“句句是真理”，所谓“天才论”、“顶峰论”，它们与“两个凡是”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。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，这就行了，我就达到目的了。

同时我也考虑了，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，叫什么呢？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，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，不引人注目，要比较新的，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，因此我写了“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”这个论断，作为我的基本主题，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。

我要说明几个观点，一个观点是：所有的理论、路线、政策，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路线，包括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包括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，是不是正确的，都要经过实践检验，没有例外。

另外一个书上并没有说，是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的一个新观点，就是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毛泽东他们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、权威，他们自己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，正确的，要坚持；错误的，要抛弃；不完全的，要修正。他们自己这样做了，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，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“两个凡是”，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，并不是不犯错的。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。我的文章必须写到这一点，再否定“两个凡是”。你们说毛主席句句是真理，要对他“两个凡是”，我就说毛主席并不认为自己句句真理，毛主席偶尔也犯错误。你的“两个凡是”不适用于毛主席，你们错了。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。

很多人参与修改，胡耀邦审定

到6月下旬，正要动手写文章了，我妻子生病了，开刀住院。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，整个晚上也睡不着觉，就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，找资料，写提纲，准备文章。花了好几个晚上。到后来妻子出院了，回家，到7月份我把文章写出来了。自己写，自己改，改得密密麻麻的再重新抄，改了好几遍。到了9月初开学了，我就把文章寄到北京去了，给了《光明日报》哲学组组长王强华。

此前，大概是5月份，王强华来南京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，会议休息期间，王强华通过别人跟我认识，他说北京也有些同事跟你的观点是相同的，你给我们写文章吧，我说好。

我最初给《光明日报》邮过去了两篇文章，一篇是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，还有一篇是《女人也是生产力么？》——这篇是原来手里就有的。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，1978年元月份报社寄来一份清样，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，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，修改一下，马上要用。

我改好了寄到北京，北京改了清样又寄回来，再修改再寄去，一直到1978年4月份，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。一天晚上，王强华接我到光明日报社，这个时候杨西光、王强华、马沛文，还有孙长江也去了，在杨西光的办公室讨论怎么修改。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要求不一样了，开始要求我收敛一点，后来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，加强战斗性，另外文章写得更准确点，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。而且时任《光明日报》理论部主任的马沛文建议点名批判“两个凡是”。我当场就说恐怕不适合，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，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要避开“两个凡是”，不可能明着和两报一刊社论直接对抗，那样不可能发表。即便发表，人家也会抓住辫子，说你公开地反对中央。而批句句真理是批林彪，批天才论，你拿我怎么样？我没有接受他的观点，大家也不赞成。

在北京又改了几遍。晚上修改，第二天《光明日报》的通讯员开了车子把我的稿子拿走，再把新的清样送来，来来往往几天。会议结束了，把我接到《光明日报》招待所又住了几天，继续修改。前后我改了六七遍稿。整个过程里，杨西光跟我谈了几次话，我也跟孙长江见了面，最后确定，交中央党校《理论动态》的孙长江等同志再改一次。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杨西光告诉我，他已经定了，先由《理论动态》发表以后，《光明日报》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，而且《光明日报》发表后，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立即转载，发通稿。实际上杨西光没有这个权力，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。开始投稿和发表的稿差不多长。修改了好多次，开始越修改越长。后来修改又变短，长长短短几遍。

这篇文章，孙长江同志作了很多修改，也提高了文章的质量。修改文章的人多了，杨西光当然也改过，马沛文也改过，王强华也改过。但从头到尾，基

本观点一个也没有改。文章开始三个部分，后来我自己改成四个部分，也没有变。第一部分，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；第二部分，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；第三，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自觉地用实践的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；第四，批判天才论，句句是真理。文章的结构没变，文章的基本观点没变，但是文章也补充了新材料、新内容，主要是加了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。文章是改得比较好的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大家都出了力。

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著作权不著作权的，那是冒着风险写文章，准备坐牢写文章的，所以没有想到后来谁的著作权问题。老实说，当时也没有想稿费，那时的稿费也刚刚开始，一点点。当时纯粹是为了拨乱反正，是为了驳“两个凡是”，开辟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

当然也没有想到效果会那么大，哪想得到嘛！所以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，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，用《光明日报》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，不以个人名义发表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，只要文章能够起它应有的作用，我就很高兴了。你看《光明日报》所有留下的稿子，上面的署名都是胡福明，到了最后发表的时候是特约评论员。所以一定要告诉你，历史就是历史，而且我推动拨乱反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，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审定发表的，功劳很大，说文章是集体创作，也有道理，人家都是动了笔给你改了的。

“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”

我离开北京之前，看过我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（他是支持我的观点的）当时对我说，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。我说我也知道，我老早就已经意识到了，知道要斗争，反正是豁出去了。黎克明说，那你有很大风险啊！我说我知道，我准备要坐牢，你要给我去送饭，因为你是支持我的嘛。他说我一定给你送饭。

文章发表后，家人和同事都支持，都很高兴。特别是南大的老师、同学，都是一个调子支持我。家人开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么内容，也不知道这个风险，后来知道了已经时过境迁了。

这篇文章出来后，有一段还是挺紧张的。后来是听了6月2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就感觉很轻松了。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，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，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，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。当时，我跟我爱人在一起。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。

文章发表是一回事，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回事。文章发表后，如果是给汪东兴、华国锋他们扼杀了，真理标准也讨论不起来。领导真理标准讨论的，应该说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是我们全党的同志，特别是理论工作者、新闻工作者。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花了大力气的，做了很多工作的，没有他们，形不成这么一个讨论的形势，也带动不了一个全

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。

那篇文章发表过后，我到各地去宣讲了三十多场，是各省市的单位自己来请的。我继续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，在很多刊物上发表。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，在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发表三个月后，我写了一篇《否定阶级斗争为纲》，寄给一个刊物，它就把我的文章压死了。编辑要用，主编不用，怕担风险。

改革开放刚刚迈步，解放思想远没到位

1979年的时候，有一次南大校党委告诉我，省委组织部决定把我调到中央宣传部去，后来还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去。但是我没去，因为我觉得大学当教师挺好的，而且北京我一个人都不熟，中央的情况又十分复杂，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复杂场合。

后来省委书记找我谈话，要我到省里去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。我当时没有表态，说让我考虑考虑吧。拖了大概一个月，学校党委书记再次来找我，因为我一直没有表态，他催我：应该有个态度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就写了封信给省委，表示作为党员，我当然要服从组织的安排，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我调到省委，让我留在学校工作，我还列了五六点理由。

报告送上去两天，我的调令就到了，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，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。进入省委，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了，否则没有道理。

我是1982年11月调到省委宣传部，到1984年底开省党代会，被选为省委常委。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。

省委宣传部管理媒体、高校还有文艺等，范围很大。我觉得我们那几年已经宽松了许多，因为解放思想的原因，大家开始全面地抓学习，彻底否定“文革”，学习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。我到省里工作的时候，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。应该说，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，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。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，还都是“文革”前那个社会主义，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，没有摆脱“一大二公”。

比如人们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议论纷纷，一些人就感叹，“辛辛苦苦三十年，一夜回到解放前”、“不但是资本主义要复辟了，地主富农也要回来啦”。又比如当时发展很快的苏南乡镇企业，因为是以市场为取向，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，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，所以当时对乡镇企业的批评也很多，说它挖社会主义墙角，是破坏国家计划经济，是不正之风的风源，请客送礼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，把它骂得一塌糊涂。

经常有争论发生，省委下面的争论很多，省里面不大容易听得见。具体怎么争论我们不很清楚。我们在省委里的争论比较少，讨论都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的。有时候中央文件有的地方也含糊不清的，譬如说，什么叫剥削，雇用几个工人叫剥削？有人说雇用八个工人叫剥削，因为这是马克思书本上说

的，靠剩余价值生活，变成资本家了。那么容许不容许呢？

所以，在那个时候当宣传部副部长，还是很艰苦的，一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，解放思想，同时还得逐步推进改革，就要对雇工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啊。我当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都采取支持态度，我以为苏联那个社会主义模式本来就是不成功的。

面对争论，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

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比较苦恼的，在我看来，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，“左”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，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，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。当然了，我认为有的人关于解放思想的还是不够的，他们的讲话并不那么科学，那么确切，于是就容易被一些人抓住了辫子，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。还好，我没有被抓住什么辫子。

江苏省的媒体也有过一些重大争论，当时有个文化界的人撰文说，四项基本原则要突破了，在文化界内部引发争论，北京也有人在批判这篇文章。省委宣传部知道后，没有参与批判。后来胡耀邦同志很快讲话了，胡耀邦同志是把这个事情了啦，说不要再纠缠了。当时好多同志讲话还是心有余悸，因为有些人老在抓别人的辫子，自己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，却想做一个裁判官。

对反对“精神污染”，我是弄不清楚的。记得我到北京去开宣传部长会议，当时邓力群主持的会议，他是宣传部部长。他点名让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发言。我在讲话中专门问了个问题，就是清除“精神污染”在经济领域里面能不能搞，经济领域里面要不要清除“精神污染”？因为如果搞“精神污染”，到处搞下去的话，经济建设也要被搞烂，去反对个体经济，私营经济，它们才刚刚起来呀，那样的话经济工作都得乱套了。请中央回答我们，否则我们不好掌握。讲了几分钟，邓力群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，他说昨天请示了胡耀邦同志，耀邦同志说经济领域里面不搞清除“精神污染”，清除“精神污染”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进行。

当时凡是穿牛仔裤，跳迪斯科，留长发，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“精神污染”。我觉得很可笑，我主张不要扩大化，人家穿什么衣服，穿什么花色，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，你别问，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，我开了句玩笑。我还批评了一些学校的干部，他们站在学校门口，把学生的裤管给剪烂了。他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。

我的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。不过我并不感觉到无奈，我们省里并不争论这些问题。当时省里常委干部主要关心的都是经济建设，特别把乡镇企业当作宝贝，“千万不要去碰它，让它们发展”。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，对一些争论我们也采取应付的方法。而且老干部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，当时我们